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明清两湖地区 乡村社会史论

杨国安 著

MINGQING LIANGHU DIQU
XIANGCUN SHEHUI SHILUN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

杨国安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 / 杨国安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12719 - 6

I. ①明… II. ①杨… III. ①乡村—政治制度—社会
变迁—研究—湖南—明清时代②乡村—政治制度—社会变
迁—研究—湖北—明清时代 IV. ①D676.4②D6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416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

杨国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719 - 6

2016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1 1/2

定价: 92.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2 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

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年2月

前 言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象与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研究的“地方化”倾向十分明显。历史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是时空的统一，不可割裂。传统史学注重历史的“时间”，岁月流逝，王朝更迭，反映了以“历时性”为基础的史观。然而，历史在“空间”的横向扩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相互流动和融合，因此，我们需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构建新的史学理论体系。此外，以往的中国通史过于强调全国的统一性，忽视了不同地区应有的内在发展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可能性，即“国家经济史掩盖了区域差异的过程与模式，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根据更均质的构想”^①。众所周知，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南北之间横跨数个气候带，东西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史学界对于历史发展的地区性差异的重视，以及学术对于微观整体史的追求，必然导致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兴起。

一、“地方化”取向：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及意义

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

^①（英）阿兰·R.H. 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96 页。

2 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

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得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从过去的“整体研究”转到地方史的研究上来，从以他者的眼光，关注影响中国历史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的对策性研究，转向以中国为中心，关注中国内部的经济、社会及其区域差异性的研究，从而引发中国“地方史”的浪潮。其标志性的作品是1964年前后，施坚雅以地方志为史料来源，以四川盆地为核心，以市场为基础撰写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以及1977年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在这些论著中，施坚雅运用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学说，对中国进行了区域经济史研究，并按照分水岭将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与此同时，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1970年出版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该书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其研究的空间集中于华南和华中地区，运用地方志等材料分析了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权力的演变。

这种地方化、区域性的研究迅速成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潮流，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社会史的成果大量涌现，如黄宗智对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濮德培对于清代湖南农业开垦与环境变迁的研究、罗威廉对于清代汉口的商业贸易与城市冲突的研究、曾小萍对于四川自贡盐业的研究、马立博对于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的研究；而且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还呈现一种由区域政治、经济向区域社会文化的转变过程^①，其中关注地区性的社会动乱，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与习俗，以及倡导从地方的民众运动去理解革命，成为研究的潮流，如孔飞力对于乾隆年间爆发于江南地区的“叫魂”的妖术的研

^① 详情可参见王日根、肖丽红：《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究、周锡瑞对于辛亥革命在两湖地区的研究以及山东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魏斐德对于晚清地处“大门口”的华南社会动乱的研究、裴宜理对于淮北叛乱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研究、罗威廉对于地处大别山区的麻城地区近七百年的民众运动与暴力文化的研究、韩书瑞对于清代华北的八卦教起义与山东王伦起义的研究、孟德卫对于山东天主教的研究、邓尔麟对于明末清初嘉定忠臣的研究等；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包括杜赞奇对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的研究、史维东对于晚清基督教与江西乡村社会的冲突与适应的研究等；此外，对于城市史的研究，尤其是城市社会群体的研究大量涌现，其中有梁永生、贺萧、叶凯蒂等对于上海城市道台、妓女、知识分子与城市文化的研究；斯特兰德关于北京黄包车夫的研究；赫沙特关于天津工人的研究；韩起澜关于上海的苏北人以及上海棉纱女工的研究；梅尔清对于清代扬州文化的研究等。此外还有其他诸如艾尔曼有关常州的经文学派的学术、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贝蒂对于清代安徽桐城士绅的研究；萧邦奇对于近代浙江地方精英的研究；穆黛安关于华南海盗的研究；包筠雅对于清代以来福建建阳书籍印刷的研究；等等。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在怀疑“普遍”的历史法则的基础上，摆脱亚洲停滞论，转向注重中国社会固有的特色，转向地域社会的研究。这期间森正夫的倡导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81年，森正夫发表了《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基调报告》，强调以综合地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场所（广义的再生产场所）为目的的方法概念。嗣后，一群志向相同的日本学者纷纷展开中国不同地域的研究，包括斯波义信对于宋代江南经济研究；片山刚对于清代广东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研究；森田明对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的研究；滨下武志对于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地域市场圈的研究；山田贤对

4 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

于清代四川移民秩序的研究；岸本美绪对于明末清初江南地方社会的研究；濂川昌久对于华南宗族的研究；滨岛敦俊对于江南民间信仰的研究；川胜守对于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上田信对于浙江山区的研究；山本英史对于清代浙江地方势力的研究；铃木博之对于徽州村落的研究；中岛乐章对于徽州乡村纠纷与秩序的研究；涩谷裕子对于清代徽州棚民的研究；田仲一成对于明代江南宗族与戏剧的研究；菊池秀明对于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地方社会的研究；三木聪对于清代福建山区基层权力的研究；等等。以上是日本学者研究传统中国区域的大致情况。

国内史学界亦呈现区域化研究的倾向，由于学者和机构众多，兹不一一详述，举其大略，如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厦门大学郑振满等对于华南宗族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北京大学赵世瑜对于华北庙会的研究；南开大学魏宏运、常建华、李金铮、张思等对于华北地区家族与乡村的研究；清华大学李伯重、南京大学范金民、复旦大学樊树志、苏州大学吴建华和徐茂明等对于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西南大学蓝勇等对于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山西大学行龙等对于华北水资源利用问题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侯甬坚等对于西北历史地理与环境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卞利等对于徽州文书与徽州地方社会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等对于江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武汉大学张建民等对于长江中游水利与地方社会的研究；等等。这种“区域化”的趋势和分工，一方面固然有着现实的技术上的考量，如相对有限的空间较容易理解和把握，以及资料搜集、田野考察和地方性知识获取等地利之便等；但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学术理路上的考虑。

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一批历史学者组织了一个集体研究计划——“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以当时正流行的“现代化”观念为研究架构，分全国为十七个区域（省份）进行研究。负责湖南研究

的学者张朋园在序言中曾经阐发了当时的动机所在：“有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循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区入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①此计划的要义在于首先讨论区域性的发展潜力，其次是地区性发展迟速不同的原因所在，两者皆统之于中国“现代化”的概念之下。

当然，这种整体与部分、国家与地方的观念，在某些学者看来是贬低了区域性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反对将区域性研究视为全国性研究的附属物，指出微观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并非“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史学研究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从认识论上看，都是利用有限的史料重建无限的历史，把握普遍的历史规律的过程。^②而且当我们认为“区域史”不同于“地方史”，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有着历史的内在脉络，以及其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特征的一致性，那么很多尽管研究对象是一定地理空间的研究成果，并不能都归于区域史研究的范畴。

总体而言，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对于理解一定区域内部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取代的意义。易言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比较容易探索出一定地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地域特征，以丰富大历史之细部。因此，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学术路径有可能如下：在总体史的关怀下，致力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力图通过加深对传统经济与社会的区域性特征的了解和认识，达到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性理解。

①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页。

② 叶显恩、陈春声：《论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页。

二、何为“区域”？从“地理空间”到“活动空间”

区域，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人们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不同的学科对于区域的含义有着不同的回答。比如地理学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质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如沙漠、山区、平原等；政治学则将“区域”视为主权国家管理与控制的行政单元，强调行政权力覆盖范围与边界，如省、市、县等；社会学则将“区域”视为相同语言、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如民族、语系等。

对于“区域”的理解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区域”的设定和划分。考虑到中国是皇权笼罩下的社会，政治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较为深远，因此传统上习惯以行政区划为区域选择的主要标准，最初的地方史研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此种划分带来的另一个便利条件之处，即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从资政的角度言之，如此则可以使得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但我们也知道，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划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也就是说经济区和行政区并非完全重合，所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按照自然经济条件划分也许更为恰当。这种见解首先体现在冀朝鼎依据农业生产（灌溉）条件与运输（水利）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的“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以后由施坚雅做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并按照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八大地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而选择相应的研究区域。比如按行政区划，如湖

北、湖南、江西等，这主要是考虑到政治、政体、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讨论政治、社会问题似乎较多采用；也有按照山脉走向划分，如秦巴山区、大别山区、武夷山区等，这主要考虑到山区地形地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有按照江河流域来划分，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汉水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如此划分，可以突出流域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其他还有诸如按照经济部门进行划分：如农耕地、畜牧区、渔业区、工矿区等。在每一个部门经济区内部又可以细分，如农耕地又可以分为稻作区、旱作区、经济作物区等。经济作物区内部又可以分为棉业区、烟草区、玉米区等。这样的划分是为了便于研究每一个产业经济部门的发展状况。其他还有如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划分为，发达地区、已开发地区、不发达地区等；按照民族成分划分，如土家族、苗族、壮族经济等。目前选择最多的可能是按照地理环境、市场网络、人文风俗等综合因素来划分的区域，如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东北等。

以上的划分原则，无论考虑行政、语言、自然等，背后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依照地理空间来划分的价值取向，即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割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但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令人完全满意的体系，是存在问题的。例如江南是否形成了一个可以认识的单一的历史单位，是自身无法证明的。此外，把某些区域当作孤立的地区来讨论的趋势，其结果必然会倾向于把这个区域同总的历史割裂开来，从而在一个本来就支离破碎而苦恼不堪的学科内部产生出新的专门研究部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地理环境远不止于舞台背景的角色，而是

真正参与到创造历史过程之中的。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到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并塑造出不同的群体心理和性格特征。因此，在历史地理的区域研究中，有学者就强调了区域的“综合性”：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在根本上把“区域”看作具有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某种经济文化特征的、被人类活动改造了的及熟化的自然综合体，受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影响的区域劳动分工与经济文化形态是形成历史地理区的基本要素。因此，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不仅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面貌的特性、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①

在强调区域的“综合性”的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区域的“动态性”。西方学者 H. 布劳德就认为：“区域是动态的，不仅因为与一系列特定识别标准相关的边界是变化的，而且因为用于识别区域相关同质性的标准也在变化。”马歇尔则提倡将“区域”视为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活动史的空间架构。^②

在此就出现了一种“区域”由自然的“地理空间”向人群的“活动空间”的学术转变。人地关系是人类起源以来就客观存在的关系，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扩大和加深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增强适应自然的能力，改变着自然的地貌和景观。与此同时，地理环境也在影响着人类活动，塑造着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也就是说，人与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和对象由“地”转向地域中活动的“人群”的时候，也就是关注“人”的活动的区域，那么随着“人群”的流动，区域也是流动的，区域的边界并非僵硬的

① 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年第6期。

② [英] 阿兰·R.H. 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6—197页。

地理界线，研究区域是研究区域中活动的人，这些人居住在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很小的地理空间之内，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常常超越其居住空间，他们要与外界进行经济系统的求学、通婚、经商、考试等。区域的内涵可以小到一个村落，但随着村庄的人群流向外界，又可以大至整个世界。

在这种“动态”的区域视野下，有学者提倡“区域是一种历史的建构”的观点。此种学术理论和见解，在华德英（Barbara Ward）、华琛（James Waston）、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等人类学家，以及具有历史人类学倾向的学者如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Helen Siu）、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郑振满等的研究中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如萧凤霞指出：因为区域发展的动力看起来来自单维的经济发展。经济因素很重要，但人是有历史经验、文化价值观和想象力的，这些因素往往与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一旦这些演员上场，与国家话语及其制度形成想象与互动，“区域”就构成了一幅多层面的、有意识的图画。这是一个结构化过程（a structuring process）。郑振满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不同的时代，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时代。在地方史研究中，要具体去看这个地区在不同的时代分别增加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在断代史研究中，要具体去看这个时代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增加了什么，改变了什么。通过对地方史的比较研究，找到不同时代的特点和变化的脉络，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问题。^①而赵世瑜则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解为一种方法论，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区域或者地方，而在于通史——它体现了一种重写通史的努力，即从地方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②

毫无疑问，区域是由一层层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造成的。

①（美）萧凤霞、包弼德等：《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

② 赵世瑜：《叙说：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载《大历史与小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

日本学者森正夫就认为，“地域社会”作为广义再生产场所的人类基本生存圈，通常由三方面构成：即生命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政治权力的生存基础——政治，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思想，这三个方面。但也不应忽视以下两个层面：其一，由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中介构成的秩序意识“场”；其二，“场”并非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在指导者的指令下所构成的统合场，由场内交往的人们自觉创造、维持。森正夫强调的“场”是由经济、道德等构成的综合体，即一个社会所有方面的总和，而其间维系各方面、作为阐释社会形态关键的是由统治者领导、大众自觉维系的社会秩序。在此，“地域社会论”与“秩序论”合二为一，密不可分。这种“秩序场”有着可变性，因此地域社会也就不必属于现实的“具体的地理界限”。^①

从区域观念本身来看，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即通过山川、方言、风俗等因素的感知，对他们心目中的空间作为感觉上的区域划分。^②最近，文化史学者将地方视为文化构建的过程。他们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们努力把地方的社会构建当成地方意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二，他们的研究显示地方是如何被用来产生认同感以便联合一个地方的居民，并把他们和别处的人群区别开来的；其三，他们探寻地方认同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最后，他们还考察以地方为基础的认同和组织模式与传统的由家族和政府组成的认同方式之间的矛盾。^③

也有学者指出：既然区域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关系

①（日）森正夫：《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汲古书院2006年版，第7页。

② 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地域观念及地理意象》，载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412页。

③（美）包弼德：《论地方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以欧美近十多年的研究为例》，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研究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着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那么，区域研究就不应该是先划定地理范围，再作茧自缚的研究类型。从某种角度上看，真正区域研究的取向应该是反过来的，即首先要追问我们何以认为这样的划定是合理的？这样的划定关系着怎样的历史建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达致对地方性传统与王朝观念、制度互动过程的深入了解，简言之，理解区域历史即意味着理解整个中国的“大历史”。这样的研究旨趣超越了“个别—一般”的预设，也超越了明确的边界锁定，从而解构了国家与地方的二元对立。^①

概而言之，“区域”既可以是一种实体概念，如地理范围、行政区划等；也可以是一种方法论概念，指准确把握史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亦即综合把握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社会生活范畴的方法。区域的结构是多层次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自然的，有社会的。因此，社会经济区域的概念，应当是社会经济有机环境、行为和价值三个层次有机结合的地域组合。只有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复原其表层的——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和深层的——经济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联系所结成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才能达到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目的。^②同时，区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是作为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活空间而存在。如此，则研究者似乎就不必过分拘泥于某种僵硬的地理界限与时间界限。对于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而言，正如章开沅大力提倡的那样，不能人为地以1840年为界限，割裂中国历史传统与近代的关联，把近代的问题当

①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杨国桢：《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页。